

第7章

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学科都不是以研究方法来确立自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理性理由的。学科由其所研究的问题、问题所涉及的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而确立。比较文学亦是如此。比较文学因其“名称没有起好”，容易被人望文生义，误以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似乎“比较”既是方法，也是目的。“比较”之于比较文学确实非常重要，但不是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本，更不是专属或唯一的方法。

比较文学有没有自己专属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文学中，“比较”是什么含义，有何特殊的意义？除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外，就当下比较文学发展而言，有哪些研究方法比较文学应加以重视，并在实践中运用？本章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7.1 比较文学有没有专属的研究方法？

韦勒克的《比较文学危机》中有句常被引用的话，原文是：“The most serious sign of the precarious state of our study is the fact that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establish a distinct subject matter and a specific methodology.”（Wellek, 1963: 282）。其中的“specific methodology”，有的翻译成“具体的研究方法”（韦勒克，1986: 51），有的翻译成“专门的方法论”（韦勒克，1985a: 122）。对普通读者来说，两种译文的意思差别不大，但对比较文学来说，却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比较文学有没有“具体的研究方法”甚或“专门的方法论”？韦勒

克认为，比较文学没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和政治界线的文学研究。它不可能局限于单一的方法：在论述过程中，描绘、特性刻画、阐释、叙述、解说、评价等方法同比较法一样经常地被应用。”（韦勒克，1985b：144）他还说：“文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史、理论和评论——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国别文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对文学的总体的研究一样（至少在观点方面是这样）。比较文学只要摆脱人为的限制，单单成为文学研究，就能够、也一定会欣欣向荣。”（韦勒克，1985b：145）这里让人感到有些奇怪，韦勒克一方面认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立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而另一方面又认为，比较文学没有自己专门的方法论，在研究方法上，与一般的文学研究没什么区别。

实际上，韦勒克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核心观点，不是批评比较文学没有专门的方法论，不是说确立了“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比较文学的危机就可消除了，而是说这些只是危机的表征，真正的症结是比较文学的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不明确。在韦勒克看来，比较文学的定位就是文学研究（因此他反对梵·第根对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人为划分），研究对象就是文学性和文学艺术的本质，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文学研究（包括比较文学）“像艺术本身一样成为一种想象的行为，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护者和创造者”（韦勒克，1985a：134-135）。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类型，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都可以在比较文学中运用。在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个案中，因研究问题的展开，可能会综合运用到多种文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不是随机或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研究对象及其所隐含的问题相关的。影响研究的对象，是文学间影响与接受的关系，要对这种关系的形成和实质进行具体的分析，则需要收集相关的资料，从中找出线索以确定问题研究的方向，因此，会较多地运用文献学、考据学、译介学、文本分析等方法。平行研究的对象，是中外文学作品/作家间的某个共同问题，因此，会较多地运用对比和阐释方法。

我们过去常常把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方法。影响研究会较多地运用文献学、考据学、接受理论等方法，平行研究会较多地运用对比分析法、阐发法等。但严格说来，并没有所谓的影响研究方法和平行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类型和研究范式，但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类型主要是规范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目的，并不是方法。研究范式，主要是研究的基本思路、路径，里面包括对研究视角的规范，但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

7.2 “比较”在比较文学中的含义和意义

“比较”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是认识事物、区别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不同特质的基本方法。正如克罗齐所提出的，“比较”是一切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不为比较文学所专有，更不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理根据。也有学者为比较文学的“比较”辩护：“比较”是最主要和最能体现比较文学特色的研究方法，一般的文学研究虽然也运用比较，但只是局部、零碎的，而“比较”在比较文学中是贯穿始终的。例如雷马克，一方面认为“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雷马克，1986a：12）；另一方面又认为“比较文学中的比较绝非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比较文学的精髓”（雷马克，2000：28）。布吕奈尔（1989：3-4）也认为：“假如像艾琼伯在他1963年的一本著名的小册子（1977年再版）所号召的那样‘比较不是理由’，假如甚至比较不是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起码它提供了一种应该恰如其分地使用的材料。在很多虚假的比较中，其中必然存在着导致发现一种影响或照耀想象的领域的一种比较。比较在比较文学中起着一种启发的作用。……在一种严格的方法的指导下，比较可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德国比较文学家霍斯特·吕迪格（1986：98）认为：“比较学者的目的与研究各个民族文学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充分理解文学作品，而且尽可能多方面地去理解。不同之处只在于对文学本身的理解

以及在方法上。”“对于比较学者说来，关键的是在运用比较方法上的自觉意识。”

比较文学学者无论是坚定地反驳克罗齐，还是迂回申辩“比较”之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似乎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比较文学学者陷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语困境：比较方法如果是比较文学的安身立命之本，那为何卡雷（1986：42）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如果说比较文学不是比较，那为何雷马克（2000：28）又说：比较“是比较文学的精髓”？

这就是比较文学关于“比较”的悖论式处境：既要否认自己不是以“比较”立身，又不能否认“比较”之于自己的重要性。因此，杨乃乔（2003：73）强调：

在理论上明确“比较”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不是一种纯粹的方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不仅有助于学术界对比较文学进行正确的理解，也有助于对“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进行学理上的区别。

我们理解了不能把比较文学在日常用语的“比较”意义上理解为是对两种民族文学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表面的类比，比较作为一种学术视域是研究主体对两个民族文学关系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一种内在的汇通性透视，是比较文学在学科成立上安身立命的本体，这就决定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

杨乃乔提出了“比较视域”说，将“比较”提升到比较文学的本体论高度，以此来区别比较文学的“比较”与其他学科运用的比较方法之不同。

“比较”之于比较文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何意义？无论是雷马克提出的“总的目的、重点和处理都必须是比较性的”，比较“是比较文学的精髓”，还是卡雷说的“比较文学不是比较”，话没说透，道理没说明白，更没从学理上阐述清楚“比较”之于比较文学的关系和意义。如果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理性是建立在比较方法上，则其学理性存在明显的缺失，缺乏学术逻辑和合理性。

陈思和从世界性因素角度谈对“比较”的认识，提出应该将比较文学之“比较”提升到本体论层面，不仅作为方法，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的视野和世界文学意识。陈思和（2006：13-14）说：

如果“比较”仅仅是一种具体方法，那就是说，你必须遵照“甲-乙”的对立模式比较其同或不同才能够获得结论，但如果“比较”是世界本原的多样性所呈现的一种状态，或者说，当世界的多元性直接呈现在你的面前时，已经包含了“比较”这种形态，那是并不需要你说出比较结论的，世界不在言说中已经把对立与和谐同时呈现了。

比较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很难摆脱把比较作为一种方法的局限，在学科建设上总给人有不成熟之感。我最近想通了一点，就是我们从未努力把“比较”从方法论提升到本体论，这就使比较文学学科总好像是在为别的学科打工，而没有注意到它正应该是凌驾于其他国别文学之上的一种综合性的研究世界文学本原的学科，它的目标是呈现与展示世界文学（人类的精神美学）是如何在多样与繁复中达到和谐的。

如何将“比较”从方法论提升到本体论？陈思和认为就是不再把“比较”作为方法论，“而是能够在研究中引进世界的多元视野，揭示出世界的多样性与繁复性。并置地呈现不同的文学精神现象本身就是‘比较’的含义，比较文学指的是多元精神下的世界文学状态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方法的比较并不重要，仅仅是我们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而选择的一种方法而已”（陈思和，2006：15）。

陈思和的观点与勃洛克的观点相呼应。1969年，时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勃洛克发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提出：“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前景，一种观点，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勃洛克，1985：196）从本体论的层面来看“比较”，“比较”就不再是方法，而是世界文学视野和世界文学多元精神现象的呈现。

学术研究，问题是第一位的，方法是第二位的，方法是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而确定的。是问题来决定研究方法，而不是方法来决定问题。对一门学科而言，就更是如此。是学问的性质来确立学科，而不是特定的方法来确立一门学科的独立性。“比较”不是比较文学学科可以

成为文学研究中一个独立学科的学理性理由。

比较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理性，是由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确立的，其关键是研究的问题具有“比较文学性”。明确了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清楚了“比较”在比较文学中的作用。吕迪格（1986：98）说：“对于比较学者说来，关键的是在运用比较方法上的自觉意识。”他举例说：

首先利用最小的文学单位（诗歌格式、散文节奏、修辞手段、惯用语、隐喻等）来使分析过程更加细致。此外，很快可以看出，事实上至少在欧洲各国文学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这是数百年来通过古代修辞理论和圣经语言建立起来的联系。这就可以证明，按种族特征来说明某个时代的特点是不行的，因为一个作家不管是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或是俄语来写作，只要他是以浪漫主义时代的精神来写作，他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按语言来区分标准，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具有决定意义，在比较文学中也并没有被忽略，因为比较文学也是一种比较与语言学的学科；但这种标准也没有被过分强调，而是与各种文学上的标准处于同等的地位。在这里，比较文学的方法与一般文学研究的方法，即与文学理论和诗学非常接近。（吕迪格，1986：98）

从吕迪格所举事例可以看出，“比较”在研究中的作用，是发现深入、细微的问题，并将它们上升到比较文学研究的立意上来，即上升到文学理论问题研究高度上来。吕迪格这里说的“一般文学研究”，应该是指“总体文学”研究，所以他才说，“与文学理论和诗学非常接近”。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关系，而文学关系的对象来源于世界文学，是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发现诸种文学关系问题加以研究。无论是世界文学视野，还是文学关系问题的发现，都需要超越一国的文学范围，具体研究中要用到比较方法，其意义是考察文学间的异同，加以分析，以此为前提再挖掘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比较文学中的“比较”，表示的是国际文学眼光、世界文学视野和普遍联系的文学意识。如果说“比较”是区别于其他文学研究的本体性特征，那么这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特征，指的是跨文化的文学视野，和将世界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系统

的普遍联系思维方式。如果说“比较”是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乃至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布吕奈尔等，1989：4），那么，这里的方法，指的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中发现比较文学所应研究问题之方法，这才是比较文学中“比较”之含义和实质性意义。

7.3 互文性理论方法

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一部作品里的符号都与未在作品里出现的其他符号相关联，因而任何文本都与别的文本互相交织，没有任何独立的文本，文本皆“互文”（intertext）。除明显的借用和融化之外，构成文本的任何语言符号皆与文本之外的其他符号形成差异，从而显示自己的特性。

互文性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定义以热奈特为代表。他认为：互文性指一个文本与可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定义以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为代表，他们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程锡麟，1996：72）互文性理论不仅注重文本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更注重文本内容形成的过程，注重研究那些“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无处不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Culler，1981：103-104）。

在卡勒看来，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文本研究并非如同传统看法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来源和影响的研究；它的网撒得更大，它包括了无名话语的实践，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这些代码使得后来文本的表意实践成为可能（程锡麟，1996：76-77）。

互文的内容包括文学思想、观念层面，创作主题、方法层面，还有文学语言等层面。互文的形式，可以是有直接的联系和间接的联系，以

及无法追踪来源，或者由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不约而同出现的相似性。互文性理论观点揭示和解释了影响来源的复杂性和难以追溯性。运用互文性理论方法进行文学关系研究，就可不再纠结于是属于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不再为无法考辨的影响来源而停滞不前，而是聚焦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

互文性研究视角，将影响因素、独创性因素、文学语境因素、作家个人的气质和才能因素，等等，都纳入研究视野，力求具体分析时切合文学创作和发展的实际。采取互文性的研究视角，就是在尽量发掘、辨识、梳理中外文学间发生关系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上，“把作品的比较与产生作品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时代心理和作者的个人心理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张隆溪，1981：137）。

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互文性概念，都能有效指涉 20 世纪中外文学复杂的关系。互文性观点将外来的文学影响、民族文学传统以及当下的文化语境的影响等因素纳入研究视野之中，充分考虑文学关系的复杂性。如果我们将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纳入互文性视野，那么各种复杂的文学关系都构成了不同层次的互文关系。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翻译文学研究占有重要位置，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翻译文学凝结着中外文学关系最初的性质，并且影响了中外文学关系之后的发展方向；第二，中国作家很多是通过翻译文学来了解外国文学的，而翻译文学性质决定了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在翻译选择、翻译过程、翻译策略、译者对所翻译作品的介绍和评价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中国的成分，使外国文学本土化。从互文性角度来看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建立联系的中心枢纽上，而构成多重的互文关系。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形成互文关系，翻译文学同时又与受其影响的中国文学形成互文关系。翻译文学进入阅读领域，获得读者新的解读和阐释，又产生新的文本意义。一旦译作对创作文学产生了影响，受影响作品与译作和原作间，又构成了新的互文和对话关系。原著 *The Sound and Fury* 翻译成中文，成了《喧哗与骚动》。受《喧哗与骚动》的影响，莫言创作了《红高粱》。原著 *The Catch 22* 翻译成中文，成了《第二十二条军规》。

受《第二十二条军规》影响，刘索拉创作了《你别无选择》。原著 *Cien Años de Soledad*（或英译本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翻译成了中文《百年孤独》，受《百年孤独》影响，韩少功、张炜创作了《爸爸爸》和《九月寓言》。实际情形当然不是这样简单的线性生成关系，这只是一个简约化的文本跨文化生成的线路图。从这个线路图中，我们看到，从原著出发，依次构成了衍生性的多重文学关系。以《喧哗与骚动》为例。*The Sound and Fury* 与《喧哗与骚动》构成互文关系，《喧哗与骚动》与《红高粱》构成互文关系。因此，翻译文学、外国文学、创作文学三者间建立起了相互指涉、彼此对话的互文关系。原作、译作构成互文关系。我们还可以从逆向思维角度，看这种顺向依次衍生的互文关系，同时也生成了一种逆向的互文关系，即受译作影响的作品，反过来，与译作、原作也形成了互文关系，构成正反互动、顺逆相存的多重互文关系，而形成一个以原作为核心的互文系统。《红高粱》也在某种意义上对 *The Sound and Fury* 构成了影响。试想，如果没有《红高粱》，我们对 *The Sound and Fury* 的解读，就止于 *The Sound and Fury* 本身，而有了《红高粱》，在世界文学系统中，我们对 *The Sound and Fury* 的解读，就多了一个参照，多了一个维度和解读视角，拓展了其文学意义。我们以此观点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系统，对世界文学间的关系就会有新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互文性理论角度将世界文学联系起来，发现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而从文本间实际的跨文化联系角度来看世界文学，则可发现作品之间相互阐释的互动关系。世界文学由此被赋予了动态生存性，是一个生生不息、相互间不断循环阐释的文学生命体。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文本在跨文化场域中，不仅生产了新文本，也是文本意义再生产，以及文学、文化互文关系的再生产。原著、译本以及读者的解读，构成了文本意义不断衍生的动态互文关系。

运用互文性理论方法，就可在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文学关系中建立一个整体观照的平台。这样就跳出了“影响—接受”模式，也不拘泥或纠结于是属于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通过问题将相关作品联系起来，继而对它们互文关系的意义进行分析和阐释。从互文关系的互观、

互识、互释中，既对各自的特质进行分析，又可从中发现共通性的文学因素。

7.4 “世界性因素”研究方法

陈思和提出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既是对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观察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世界视野。陈思和（2006：11）认为：“中国在 20 世纪已经不是一个封闭型的国家，它越来越积极地加入了与世界各国的对话，自然而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现在的中国人说出‘世界’这个词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指一个排除了自身因素的物理空间，而已经包括了自身，即中国本身就成了世界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世界的问题。所以，讨论‘20 世纪中国文学’时不能不考虑到它的世界性因素，反之，讨论‘世界性’的时候也自然包括了中国文学的自身因素。”二是对话性。“世界性因素的理论研究则是把‘世界’视为一个广阔的思想平台，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形态的现象都在这一平台上呈现出来，构成一种丰富繁复的多声部的对话。”陈思和（2006：12）说：“其实，我想做的就是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性因素’中形成与世界的对话机制，是如何构筑起这样一种对话的平台。”（陈思和，2006：12）三是共同性。“比较文学是以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但其理想的境界就是要在人类非常不同的精神现象中揭示根本的和谐性，我把它看成是这个学科的理论基础。”（陈思和，2006：11）

“世界文学因素”既是中外文学对话的平台，也可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世界性因素”涵括世界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很多内容，是一个非常广阔而丰富的“形式库”（repertoire），从中抽出任何一种因素，都可以作为观察世界文学的视角，因此，具有了方法的意义。

陈思和的“世界性因素”概念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微观层面，涉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等，“可以包括作家的世界意识、世界眼界以及

世界性的知识结构,也包括了作品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以及各种来自‘世界’的构成因素”(陈思和,2006:11);二是宏观层面,涉及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体到文学,就是以什么样的视野和角度去看待中外文学关系。因此,“世界性因素”既可以视为具体的文学要素,也可以作为切入文学现象分析的方法;既可以作为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意识,也可以作为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外文学对话的平台,内涵非常丰富,包含了多层次的含义:

一是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在文学观念、文学主题、文学创作手法等方面的相互观照与互识。在世界性因素的视域中,构成互文关系。

二是作品所体现的共通性的文学因素,如文学主题方面的命运、爱情、成长、苦难、乡愁,文学母题方面的生离死别、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恐惧无畏等,精神现象方面的颓废意识、忏悔意识、荒诞意识、现代意识,创作方法方面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等。

三是作品所揭示的人类生活体验的共同经验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共同问题,以及所表达的世界性主题和人类共同价值。

四是将某种本土的文学现象纳入世界视野中来考察、分析。

五是从一定意义上,世界性因素与洛夫乔伊的单位观念类似,可以将世界性因素作为某个诗学要素或文学理论问题来加以探讨。

因此,“世界性因素”可作为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在中外文学关系的不同层面挖掘出问题,加以研究。

7.5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

当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息数据的充分搜集、整合和运用成为可能。在信息化时代之前,人文学科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具有博闻强记的能力,靠阅读知悉相关文献,靠记忆和摘录卡片来做研究。但即使一个学者再聪慧、再勤奋,他的阅读范围和阅读量也总是有限的。以大数据为依托的数字人文技术,可以搜集和整理海量的信息,根

据关键词等设定的程序，可以迅即梳理出所需要的信息。文学研究方面，此前的风格和文体研究，往往只能凭感觉和印象，辅之以少量的典型事例对某位作家的风格进行阐释。其得出的结论，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现在，通过建立某位作家的作品数据库，针对风格特征的相关指标，就可得出作家所喜欢使用的词汇和词频。风格研究建立在客观、真实的数据基础之上，研究的结论，也更科学，更具有说服力和学术价值。

20 世纪之前，世界上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十几万部。到了网络化时代，每天通过纸质和网络发表的长篇小说就有数万部，更别说不计其数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如此海量的文学作品，一个学者即使穷尽一生，其所阅读的作品也是非常有限的，相对于海量的文学作品，只是沧海一粟而已。那谁能称自己是世界文学研究学者，又如何从如此海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出关于世界文学的问题？莫莱蒂提出“远读”（distant reading）概念，即借助相关文学领域研究专家的成果来进行世界文学研究。但即使运用“远读”方法，也难以解决世界文学的海量阅读问题，因为还有很多文学作品，甚少有人阅读，更少有人做研究。

数字人文、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为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展现了新的前景。大型的文献数据库的建立，为资料查询、检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如“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根据大数据分析，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信息整合，得出了较为宏观的唐诗影响力、词频、地理分布等统计信息。有媒体工作者利用新浪文本挖掘工具，对《全唐诗》文本进行了逐字切分式的大数据分析，并从词频、意象、词汇、语义网络、字向量、情绪等维度，分析了唐诗的高频词、典型意象、色彩、双字词、关联字、情感倾向等（严程，2019：76）。芝加哥大学文本光学实验室与上海图书馆合作于 2016 年开始建设“民国时期期刊语料库检索平台（1918—1949）”，将上海图书馆馆藏民国时期期刊以全文电子版的形式呈现出来，建成“Republic China Periodicals Corpus（1918—1949）”的大型期刊语料库平台。对民国时期活跃着的上万名作者的笔名、别名、生辰、籍贯、教育、出版、行踪等元数据（meta data）信息进行

逐一考辨和编纂工作，同时攻克现代中文文献分词（tokenization）和文学文类自动识别（genre identification）等技术难关（赵薇，2019：72-73）。“通过对逐词检索（CONCORDANCE）、关键词居中检索（KWIC）、词语搭配（COLLOCATION），以及时间序列（TIME SERIES）的综合运用，已经基本可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和思想文献实施一种远、近交替的初步观察。”（Stewart et al., 2020：177-178）概念史、观念史研究是近些年的研究热点。概念的译介、传播、演绎、衍生、演化，进而在中国语境中形成带有中国时代和文化语境特征的观念和话语，需要历时性地广泛搜集资料，不仅包括书籍，还包括报纸杂志等。过去靠人工查找、钩沉、辑录、阅读、分类等，都是工作量巨大的工作，并且还难以保证资料搜集的齐全、完备，尤其是报纸上的文章，更是容易被遗漏。有了类似于“民国时期期刊语料库检索平台（1918—1949）”这样的数据库检索平台，概念史、观念史研究的史料搜集、整理的工作量就大大减轻，研究人员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资料的分析上。

再如“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集汉译文学初刊文献史料专题库、知识库、分类目录索引、编年阅读于一体，以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史结构方式，对每一译作来龙去脉进行考寻，系统发掘、考辨和整理了汉译文学初刊文献史料，“使相关的史料文献以及研究成果得到一次全面的发掘、考辨、汇聚和整理”（李今，2015：12）。

马修·高尔德（Matthew Gold）认为：“数字人文工作的应用模式预示着人文学术性质的重大转变。”（陈后亮，2022b：17）数字人文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马修·乔克斯（Matthew Jockers）也认为：“现有数据的绝对数量使得传统细读作为一种详尽或确定的证据收集方法站不住脚了。……文学研究者必须采用新的、主要是计算性的收集证据的方法。”（陈后亮，2022b：21）

数字人文将给文学研究带来哪些变化？陈后亮（2022b：20）认为：“大数据方法让我们能够提出从未想到过的问题，看到从未被看到的模式，且能够对世界获得各种新的洞见。”“借助计算机手段，人文学者能够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做一些更精细的研究，如统计单词出现频次、总结规律化的句法结构、探寻单个文本与复杂社会因素的关系等。”

(陈后亮, 2022b: 25) 姚达兑 (2021: 243) 认为, 数字人文最明显的优势体现在范围的扩大和观念的更新。他分析了数字人文四个方面的优势:

其一, 数字人文采用数据建模、分析的方式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 将许多传统研究中“未读”的、“非经典”的文本纳入研究者的研究体系中。其二, 随着数字人文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张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变得更加具有整合性和扩展性, 文学研究逐渐与其他学科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实现跨学科研究, 具备了传统人文方法无法企及的优势。其三, 数字人文为传统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两者应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当然, 借助计算机的海量阅读分析, 那些原本在细读中发现不了的、看似毫无关联的作品, 有可能会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和关联性。其四, 利用数字人文进行文本分析, 将会触发一些新型的问题和新型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在读图时代, 在生长于电子阅读时代的读者成熟之时——因为阅读介质和方式的转化, 也给读者/研究者带来了思维的转变。(姚达兑, 2021: 243)

但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的, “作为人文学者, 我们坚信人文研究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以特殊视野实现对社会的批判性监督。无论是在文本还是现实世界, 有关平等、权利、身份、正义、公平和共同体等重要问题的想象将会永远存在, 而且永远不会仅仅靠大数据计算来得到答案, 因此也永远需要持续的批判性探究”(陈后亮, 2022b: 24-25)。

从现有的利用数据库和数字人文所做的文学研究结果来看, 大部分成果的结论, 都是此前文本阅读所得出的结论引入大数据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 所谓大数据分析成果, 实际上只是已有文学研究成果的可视化、图表化转换而已。研究结果还没有超出传统文学阅读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且, 运用大数据得出的所谓“结论”, 很多都是常识, 并没有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点、新结论。对文学史没有增添新的认知, 更没有提出具有文学理论意义的大发现、大问题。

运用大数据应该研究哪些靠个体阅读所无法进行的课题? 可发现哪些深潜于世界文学中而更具文学理论价值的问题? 这是我们所需要思考

的，也是数字化文学研究研发、引导数字人文文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

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暂时悬置定见/成见，隔断主观印象式判断，而以数据直观呈现客观事实。但数据和客观事实并不必然呈现意义。文学事实的意义，需要由问题来催化、激发、点化，需要放回到世界文学中来观照，需要由问题探索的诗学价值目标来蒸馏、提炼、升华。

指出目前数字人文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不是否定数字人文文学研究意义，而是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运用数字人文，发挥其在文学研究领域更大的作用。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就是要研究过去人工阅读所无法进行的问题。如果运用数字人文仅仅是减少了文献搜集和整理的工作量，这还只是数字人文技术的一般化运用，还没充分发挥其优势。运用数字人文研究什么问题，研究什么层次的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如何？这是对人文学者如何运用数字人文问题意识和学术智慧的挑战！

沿着莫莱蒂的“远读”思路，针对某个问题搜集数据，精确化“算法”，是有可能发现对共同文学现象或普遍性的文学问题的认识的。在初步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再提炼、阐释，就有可能发展出对世界文学某个具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总结。例如文学主题研究，我们可以借助数字人文分析构成作品主题的因素和辅助因素有哪些。越是优秀、深刻的作品，其内涵越丰富，并会涉及不同的主题。我们常常将某些作品归为某种主题，这样判断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大致归为同类主题的作品，有哪些共通性因素？这些因素（“次主题”）又是如何映衬、烘托了我们比较一致认定的作品“主主题”的？它们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如《哈姆莱特》《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呼啸山庄》……？一些文学主题会在古今中外不同时代出现，成为恒定的、经典化的主题，如人性、命运、爱情、苦难、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等等。一代代重复性主题的作品为何还为后代读者所阅读、喜爱、接受？

过去的《文学理论》《文学原理》之类的著作，都是作者在自己阅读的基础上，借鉴有限的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撰写而成的。其所总结出的理论和原理，是否具有普遍性，是难以检验的。现在，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就可以做到。只要设计出具有共同诗学的问题，如钱锺书提出的

“诗可以怨”，周珏良提出的长篇小说空间与人物命运发展的潜在结构关系，等等，我们都可以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加以验证。

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无疑会极大促进比较文学的发展。梵·第根当年反对将总体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范围，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不可能研究那么多文学，只能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两个作家、作品之间。而现在，借助于数字人文技术，是有可能进行总体文学研究的。

运用数字人文、大数据等新手段来研究文学是必然趋势。关键是要增强数字人文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充分发挥高科技手段的作用，发掘文学研究中潜在的重大问题。问题的学术含量决定了研究的学术价值。

数字人文与比较文学的结合，会为比较文学开拓一个新的充满魅力的学术空间。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要向数字人文文学研究提供问题库，以引领数字人文文学研究的方向，如此，则将对共同诗学的探讨，带入一个新的学术境界。